

尼泊尔有人将珠峰变成摇钱树

1953年5月29日，在夏尔巴向导丹增·诺盖的带领下，新西兰探险家艾德蒙·希拉里成为这个地球上最早登顶珠峰的人，为后来的冒险者们打开了新的高度。

70年后，攀登珠峰逐渐成为一项时髦刺激的活动，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尼泊尔政府对登山者资质的审查逐渐放松，以至于几乎有钱就能请向导上山。丹增·诺盖的儿子诺布·丹增不禁感叹，如今的珠峰真成了一棵“摇钱树”。

尼泊尔国内著名的“七峰探险”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目前对登山者的经验和身体条件没有硬性规定，即使“小白”也可以找他们定制登山服务。



从空中拍摄的珠峰

登珠峰成时髦运动 花销几十万到100多万不等

对全球登山爱好者来说，攀登珠峰的路线主要放在尼泊尔境内的南坡。中国境内的北坡不仅自然条件艰苦，而且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对开展登山运动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而从尼泊尔境内攀登珠峰南坡则几乎没有条件限制。

随着越来越多的业余登山者愿意花钱“氪金”攀登珠峰，在欧美富裕国家攀登珠峰的报价也水涨船高。

对于西方游客来说，从旅行社报名参加一次普通的珠峰之旅至少要花费6.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5.8万元），另外自己还应准备至少几千美元购买额外装备等。如果需要配置一名能讲英语、提供全程服务的西方向导，价格肯定要超过10万美元。对于一些追求极致的玩家来说，也有20万美元左右的项目可以为他们带来一次难忘的珠峰登顶体验。

著名的Furtenbach旅行社官网显示，珠峰南坡登顶的基本套餐价格为7.05万欧元，最贵的“尊享版套餐”价格高达19.9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52万元）。“尊享版套餐”为期21天，客户不仅可以享受珠峰大本营最豪华的房间和专职营养师量身定制的饮食和登山计划，同时还有摄影团队和2名夏尔巴向导全程跟随。

尼泊尔迫切依赖登山行业带来的收入，因此对登山者的资质审查也较为松懈。对于此前没有高原雪山登山经验的人来说，只要能负担得起足够高的价格，甚至可以享受“被人抬着上山”的一条龙服务。

外国“中间商”赚差价 当地旅行社基础套餐仅2万多

根据尼泊尔政府的规定，外国旅行团到达尼境内后，必须要找当地向导和安全员合作。很多时候，外国旅行社实质上是雇佣的尼泊尔国内旅行社的服务。许多外国旅行社实际上通过转手赚取了大量“差价”，给尼泊尔当地公司留下的利润空间不大。

据报道，尼泊尔各个探险公司对客人的平均报价不到4万美元，即使配备来自西方的英文向导，价格也只有6万美元左右。很多主打低价的尼泊尔旅行团更是在市场上

极富竞争力。当地“七峰探险”旅行社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只需3.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3.9万元）就可以帮助客人登顶，并且配备中餐和中文服务，而且对客人的身体条件、登山经验等没有硬性要求。

如果外国游客抵达首都加德满都后再从当地寻找旅行社，会得到很多便宜的报价。比如在Trip Adviser网站颇受好评的一家尼泊尔旅行社网站显示，最基础的珠峰攀登套餐（16天）仅需3799美元（约合人民币26799元），其中包含基本的食宿、登山装备，团队配备2名搬运工和1名英文向导。

旅游支撑尼泊尔经济 疫情后迎来“报复性登山”

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尼泊尔旅游业收入达到8.01亿美元，在25年间增长近4倍，其中登山行业带来的收入占很高比例。

每一名来到尼泊尔境内登山的人都会面临诸多必须开支。尼泊尔90天签证（中国人可申请免签）的费用是100美元，疫苗接种费用200美元。首都加德满都有各种档次面向全球游客的消费选择，每天的开销在100—700美元。美国商业媒体估算，在尼泊尔添置个人登山设备可能需要6000—8000美元。

对于尝试征服珠峰的冒险家来说，每年最佳的登山时机是3月—5月。在这个季节申请登山许可证，需要向尼泊尔登山协会缴纳1.1万美元。此外，在夏季和秋季短暂的时间窗口内也允许登山者申请许可证，至少也要花费数千美元。小镇卢克拉汇集了医院、商店等资源，几乎是登山者从南坡上山前必经的落脚点，从加德满都到卢克拉的机票也不便宜，约为379美元。

尼泊尔在2013年实施的新规要求，在尼泊尔登山的每一个外国登山者必须雇用当地的夏尔巴向导，至少增加了4000美元的成本。从卢克拉步行到珠峰大本营需要一周多时间，如果雇用搬运工或牦牛帮忙驮行李，每个人的工资至少为每天75美元，每头牦牛则需要150美元一天。而在珠峰大本营，一罐可口可乐能卖到50元人民币。

在新冠疫情期间，尼泊尔旅游业整体遭受重挫，与登山相关的行业也一度凋零。到

疫情最初爆发的2020年，尼泊尔的旅游业收入仅2.3亿美元，比2019年下降72%。

新冠疫情结束后，尼泊尔人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报复性登山”。据当地媒体今年4月26日报道，截至当时共有1009名登山者获得了今年春季攀登尼泊尔23座山峰的许可证。截至5月中旬，尼泊尔当局共发放了478张攀登珠峰的许可证，为过去70年之最。光是珠峰这一座山峰，尼泊尔当局预计今年可以获得580万美元许可证收入。

运一具遗体7万美元 垃圾堆积造成严重生态污染

珠峰“人满为患”也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使得近年来攀登珠峰的死亡率又有所上升。前几日，一位澳大利亚男子在珠峰不幸身亡，成为这个登山季第10位遇难者。

除了国际登山客之外，当地土生土长的夏尔巴人也冒着生命危险年复一年在雪山讨生活。据报道，从事登山向导、搬运工等职业的夏尔巴人在登山季大约可以赚到4000—6000美元，远高于尼泊尔人平均700美元的年收入。不过，长期在缺氧环境下搬运重物、无数次往返危险地带，也让夏尔巴向导的死亡比例高达2.4%，被媒体称为“全球最危险的工作”。

由于珠峰常年发生遇难事件，在一定高度上遗体又很难被直升机运下山，只能依靠有经验的夏尔巴人徒手带下山，搬运一具遗体的成本可能高达7万美元。据统计，珠峰上可能还埋藏着约200具遗体，对于登山者来说，在攀登路线上碰见遗体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此外，包括人类排泄物、啤酒罐、一次性餐具之类的垃圾也常年在珠峰堆积，造成了严重的生态污染。尼泊尔旅游局2014年宣布，所有攀登珠峰的人，除了要带走自己产生的垃圾外，还必须再带约8公斤的垃圾下山。但这一规定未能得到严格执行。科罗拉多大学环境学家拜耶斯去年估计，珠峰大本营区域遗留的垃圾总量达到了4500吨。

相关新闻 湖南16岁女孩 众筹50万元登顶珠峰

5月15日，16岁长沙女孩徐卓媛从尼泊尔南坡成功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成为中国从南坡登顶世界之巅年龄最小的女性。

今年3月，徐卓媛和父亲徐江雷发起众筹，希望用众筹的方式来获取攀登经费50万元，但此举引发较大争议。5月15日徐卓媛登顶成功后，有媒体记者再次点开当初的众筹链接，发现该项目已过期，筹款进度定格在53.2%，最终筹集到资金266000元。此外，徐江雷透露，江苏一家药企赞助了徐卓媛登山资金30万元。光这两项“赞助费”就达到了56万元以上，超过原先的50万元众筹目标。

有业内人士也表示：“攀登珠峰的费用确实在30万元—50万元，选择的团队和套餐不一样，价格也会不一样。”

本报综合消息

AI歌手全球出道，有喜有忧

从ChatGPT到AI作画，如今人工智能已席卷各行各业，音乐界也未能幸免。自嘲“冷门歌手”的孙燕姿，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坦然面对“AI孙燕姿”在网络上的火爆现象。与正在罢工的美国编剧“誓与AI死磕到底”不同，孙燕姿面对AI的态度显得风轻云淡：“我想说的是，你跟着一个每几分钟就推出一张新专辑的人还有什么可争的。”其实在音乐圈内，早就有人采用AI模型来作词、作曲，选择合适的歌手进行AI试唱；放眼全球乐坛，国外不少AI歌手也已“出道”，歌迷们的态度在悄悄转变，争议也随之而来。

“AI孙燕姿”唱《好汉歌》

如今，许多娱乐行业工作者和普通歌迷都已经加入“全民打造AI歌手”的行列之中，并不认为是在“抢真人歌手饭碗”。在“AI孙燕姿”最早出现的B站上，有上千首“孙燕姿演唱歌曲”，音色逼真，类型丰富，其中不乏像《好汉歌》这样的“跨界翻唱新曲”。

“AI歌手让歌迷们梦想成真！”英国《卫报》近日发现，虽然音乐创作者还在担心自己会被替代，但广大乐迷早已被人工智能强大的翻唱能力所征服。就在上个月，英国流行男歌手哈里·斯泰尔斯“翻唱”迪士尼经典影片《莉琪的异想世界》主题曲的视频在TikTok上走红——这就像“AI孙燕姿”唱《好汉歌》，斯泰尔斯本人当然没有唱过这首老歌，可视频中惟妙惟肖的音色却令他的粉丝们疯狂。“听到这首曲子的一瞬间，我突然不再害怕人工智能了，”意犹未尽的乐迷们畅想未来还可以让斯泰尔斯去翻唱霍齐尔的《带我去教堂》，以及拉娜·德雷的《伤心女孩》。

《卫报》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粉丝们最开脑洞的幻想都可能得到满足，而且压根就不需要歌手本身来参与。这种操作还可以扩展歌手的创作范围，并让那些已故、退隐的老歌手“唱出”新作品，像已解散的老牌乐队绿洲，近期就因AI翻唱而重新“复出”，人工智能根据主唱利亚姆·加拉格的声音打造的“新专辑”足以乱真，在视频网站上一周内就获得30万播放量。

站在哪一边

对于这样的前景，歌手和唱片公司反响不一。加拿大女歌手格莱姆斯表示，她接受那些以音色为公开模型训练出来的AI歌手，前提是她能从中获得50%版权收入。在《福布斯》看来，这会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有侵犯版权的风险。TikTok上有不少虚构的AI歌手演唱曲目，像嘻哈巨星德雷克、肯德里克·拉马尔和侃爷“合唱”了一首动漫歌曲，获得200万点赞。另一首由AI威肯和德雷克合唱的原创单曲《我袖子上的心》也获得超900万的播放量，却引发环球唱片公司的不满和抗议，最终要求创作者将这首AI新曲从流媒体平台上撤下。

环球音乐不久前向流媒体平台发出通牒：“你们是要与艺术家、歌迷和人类的创造性站在一边？还是与深度造假、欺诈和剥夺艺术家赔偿站在一边？”《福布斯》分析称，站在拥有大批签约音乐家、手握海量音乐版权的唱片公司的角度来看，他们当然不希望AI软件利用他们的歌曲和歌手免费生成新作品，这也是AI歌手目前所处的最大灰色地带：“AI歌手的训练素材受版权保护，但目前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哪些素材可以用来训练，哪些不能。”

给音乐产业敲响警钟

美国法律界对此也存在争议。有律师认为训练AI歌手并非传统的“非法侵权”，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对原创的损害，应明令禁止。法律保护的是音乐原创，而不是机器”。今年3月，美国版权局就“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更改了音乐注册程序，新规要求注册者提供作品中AI创作的部分内容，以此来分辨到底是来自“原创者的初心”还是“人工智能的机械复制”。

法律界的担忧难以阻拦人工智能在音乐领域越来越受欢迎，如今各个平台上都充斥着“AI迈克尔·杰克逊版的《走运》”“AI格莱娜德的《美国排队》”等翻唱。在《卫报》看来，以环球唱片为代表的音乐制作方仍在坚持“乐迷和歌手应统一战线”，摩根大通的分析报告也显示“乐迷们爱上的是歌手艺术家而不只是音乐”。维多利亚·卡纳尔等创作歌手自信地认为AI无法取代艺术家的核心，“就像AI德雷克乍听很惊艳，但无法取代德雷克本尊”。但从另一个角度看，AI歌手的确给古老的音乐产业敲响警钟：既然AI翻唱如此受欢迎，至少也给艺术家们带来反思，去了解他们的乐迷到底想听什么。

本报综合消息



登山者在珠穆朗玛峰的山脊上。